



女性主义媒介研究

> “扭曲”在许多针对媒介的女性主义研究方法中是个关键概念。人们常说，相对于妇女占人口的事实而言，妇女在媒介内容中的再现极为不足。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2006年“金苗”项目支持 另外一种说现实中工作的妇女要比我们在媒介内容中看到或读到的多得多。还有一种观点是，媒介内容呈现的妇女被奉为理想状态的谦恭顺从和随叫随到，消费行为被表现为实现自我的途径，穆里尔·康展现的妇女形象 “在我们这个高度分化和 复杂的社会中根本不能代表妇女所处的地位”。 无独有偶。

琳达·雷兹尔-史密斯也谴责广告业没能跟上社会变迁的步伐：“尽管人口统计学（数学）发生了人们的心态并没有改变 ……我们似乎正在遭受一种文化上的滞后 ——也就是说，我们这 Feminist Media Studies 见解和观点滞后于妇女的现实情况”。 >> 妇女生活和经历了许多方面没 这一点似乎是 不可争议的。 职业妇女的数量要 比媒介所显示的 电影或电视连续剧中的 “祸水红颜” 在现实中实难寻觅。

妇女的愿望也远远超越传统妇女杂志中描绘的家庭生活。因此，女性主义者呼吁更加真实的妇女形象和女 这种呼吁看起来完全是合情合理的，但事实上，这一说法是存在问题的。首先，刻板形象并非 而是社会实践中习以为常的对于事件、经验、人或物进行识别和分类的一种极端化了的表达。刻板形象通常 这些摹本似乎使得这些刻板形象合理化了。 女性主义者批评媒介通过塑造家庭主妇和母亲的形

对这种说法，通常的反应是这样的：现实生活中，许多妇女的确身兼家庭主妇和母亲两职。 “媒介如此表现又有什么不妥呢”？ >>>> 女性主义者有关社会性别刻板形象的观点可并非像要求更真实的女 女性主义者在“什么是女性真实的社会地位与本质”的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因此在媒介能够传达更加 最迫切的是给什么 才是妇女的真实下一个 无可辩驳的定义。 否则， 传

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个问题的焦点是对社会性别“真实性”的理解，它在理论中有时被 定义为社会位 如呼吁对女性的社会角色要有更加真实的 反映。但在其他一些时候又被定义为： 如呼吁对女性的心理特点要有更加多样的表现。显然，在传播的传达模式中，社会性别被认为是一种几乎 简单明了的男女差异，而这种两性差异应该 [荷] L. van Zoonen 著 曹晋 曹茂译 得到准确无误的 概念化是肯定存在问题的。 因为它否认社会性别的动态性质、 历史和文

以及它的相互矛盾的含义。 >>>> 如果我们承认当前有关两性支配性观念的历史特征， 就可以了解社会性别是被建构起来的。在这种研究路径中，“扭曲”将成为一个空洞的概念。 因为根本没有真实的人类。 男性或女性身份是如何构成的问题作为参考。

因此对于媒介究竟应该表现什么也就没有标准了。 人类的身份和社会性别被认为只是 换句话说， 社会性别也就是环境、 机遇和限制的产物。

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2006年“金苗”项目支持

女性主义媒介研究

Feminist Media Studies

[荷] L. van Zoonen 著

曹晋 曹茂 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Sage Publications of London.
Thousand Oaks and New Delhi, ©Liesbet van Zoonen, 1994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06-06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女性主义媒介研究 / (荷) 祖伦 (Zoonen, L.v.) 著;
曹晋, 曹茂译.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8
ISBN 978-7-5633-6687-3

I. 女… II. ①祖…②曹…③曹… III. 女性—关系—传
播媒介—研究 IV. G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27271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 541100)

开本: 680 mm × 920 mm 1/16

印张: 16.25 字数: 170 千字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3 000 册 定价: 3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译者序

曹晋

无论女权运动的业绩如何,其最终促使学界研究并支援妇女运动的诉求(Cantor, 1988: 76—81),促进了妇女自我的警觉与传播研究的批判意识,并催生了女性主义媒介研究。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传播学教授凡·祖伦(Liesbet van Zoonen)的《女性主义媒介研究》(*Feminist Media Studies*, 1994)是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第一本体系化的女性主义媒介研究专著。作者凭借其广博的知识与开阔的视野,综合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方法,从批判理论与女性主义研究,再到心理分析、后结构主义与文化研究,系统性地展示了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异质性和丰富性。涵盖的主题包括:刻板形象、色情与新闻意识形态、广告、电影与电视的男性气质、族裔、流行文化与方法论。在本书问世之前,该领域的成果形式以单篇论文和论文汇编而成的选集为主,极具挑战性的观点与学术价值被成果的零散与庞杂削弱了其应有的光芒。

在西方学术界,“社会性别”已经和“阶级”、“种族”一样成为研究人类社会与历史的一个基本的分析范畴,在各个人文社科领域被广泛运用。本论著也不例外,“社会性别”作为《女性主义媒介研究》一个重

要的论述概念(当中也贯穿着阶级与种族的分析),作者围绕它提出了种种问题:社会性别话语如何在不同“阶段”的媒介意义的生产中被建构?社会性别话语如何被编码于媒介文本?哪些意义可以在媒介文本中寻觅得到?这些意义源自何种话语描绘?受众如何在与媒介文本互动的社会情境或相关的社会实践中建构社会性别?作者解答这些问题时立足于一个基本的起点,即承袭20世纪7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的重要论点:社会性别区别于生物性别,是被社会与文化实践所建构的,是不稳定的。凡·祖伦以后结构主义的认识,分别从媒介生产、媒介文本、心理分析与媒介受众等方面探讨社会性别意义的建构,把社会性别作为一个“因变量”(一种话语)来操作。在她看来,社会性别就是“被建构于一种通过构连日常生活持续变化的、互动的,而且矛盾重重的结构与文化安排的混合体……制约所有问题的关键是权力的机制问题,权力既是压迫性的力量,又是生产性的力量”(van Zoonen, 1994:131)。既然社会性别是被建构的,而且“社会性别的建构作为一种过程和社会互动与权力关系的产物,是能够被分析的”,所以,凡·祖伦提出以“一种诠释的研究策略”来分析人类的互动与意义结构。本论著的女性主义媒介理论与研究洞见都以此为基石。

凡·祖伦把女性主义研究定位为一种激进的政治化研究过程,在她看来,女性主义研究与文化研究都“成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左派政治理论,并与学术之外的进步政治运动和社会关怀相关联。两者都有展开文化批评的雄心壮志,致力于更好地理解并削弱各种权力关系”(van Zoonen, 1994:6)。同时,其主张的质化研究蕴涵着深刻的自反性(或反思性),启发读者对知识建构的主流合法性具有批判能力,重构了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生命力与社会价值。例如,凡·祖伦已经抛弃了以 subject 来称呼研究对象的做法,而换用了更加尊重妇女参与的 participant 和 respondent,注重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互动(inter-

action)和彼此的关联(connection),也就是放弃过去那种自称中立、客观且冷漠的研究态度,而以一种平等、理解与局内人的立场进行研究,日常学术实践超越了研究本身,体现出女性主义姐妹情谊的胸怀。她很重视妮娜·格雷格(Nina Gregg)所强调的女性主义的研究成果如何为学术界之外的妇女所用,也就是为妇女解放的学术研究的可用性和可理解性的问题。她也很认同米斯(Mies, 1978)的主张,即女性主义研究者应把“双重意识”整合到研究进程之中,也就是意识到她们自己作为妇女所受的压迫和她们作为研究者所拥有的特权,这样才可以阻止两种角色之间产生新的不平等和剥削(van Zoonen, 1994:129)。凡·祖伦对人类学的“民族志”(ethnography)方法在传播研究中的具体运用进行了评价,敏锐洞察了民族志媒介研究的问题所在:“如果缺乏与信息提供者长期深入的接触,似乎难以对研究对象的特定文化实践进行整体的理解。”(van Zoonen, 1994:131—132)她还就格拉斯和斯特劳斯(Glaser and Strauss, 1967)提出的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结合文本结构的话语分析,展开两者的比较研究,为愿意从事女性主义媒介理论和研究的学者提供了合适的分析策略。总而言之,凡·祖伦倡导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关切点要回到日常生活的具体场景之中去,展示妇女的经验(women's experience),以女性主义的视角(perspective)来使用现有的方法,或是根据其视角提炼新的研究方法,清晰地体现了女性主义媒介研究与一般媒介研究的视角差异,从而克服了纯粹理论研究、经验研究与妇女实际生活经验脱离的缺点。《女性主义媒介研究》一书所描绘的妇女受众的收讯研究,兴起于特定的文化研究与女性主义研究的结合,也是女性主义关怀与媒介和流行文化相互关联的经典议题。霍尔将编码(encoding)和解码(decoding)的过程分开,突破了文本框架内的意识形态研究套路和“文本决定论”所导致的研究结论缺乏说服力的弊端。凡·祖伦也吸取了霍尔

的论点,她回顾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介入媒介收讯的各类研究,一方面赞许当代受众研究已把植根于社会和权力关系之中的日常生活情境与受众自身的文本解读的情感相结合,因为这些收讯研究主张妇女受众从媒介产品中获得建构意义的权力,而不是被给予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大众文化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传统关系。于是,妇女受众成了意义的生产者,而不是媒介文本传输的意义消费者。正如凡·祖伦所言:“受众不再被视为由媒介定义或是召唤的被动臣服于别有用心的特定权力与意识形态的意图;相反,受众是主动的意义生产者,按照自己的日常生活与文化来阐释、容纳媒介文本的意义。”(van Zoonen, 1994:149—150)而且“肥皂剧与言情小说就是妇女文化的一部分,在那之中,妇女私领域的主题和价值得到彰显,妇女被认为是理性的,而且妇女也可以嘲讽传统父权制的态度与道德,这是妇女愉悦的源泉之一。在流行文化的收讯中,社会性别认同持续地发生不易察觉的重构。给予妇女愉悦的流行文化可以被视为一种潜在的颠覆的源泉……”(van Zoonen, 1994:150)另一方面,凡·祖伦也指出,如果我们认同流行文化的“愉悦政治”(politics of pleasure)对妇女具有自由、解放的意义,那么,女性主义的媒介批判政治也就枯萎了,难以发挥综合的文化批判的潜力,因而,“我们愈加难以批判流行文化建构了一套社会性别认同的霸权体系”(van Zoonen, 1991a:35,转引自 van Zoonen, 1994:7)。显而易见,流行文化的愉悦与女性主义的政治目标之间矛盾重重,凡·祖伦的论证超越了对理论分歧的辩难,转而批评现有的媒介极为忽略如何动员与支持女性主义的思想与行动,急切地呼吁提升媒介如何扮演“公共知识的代言人”的角色,以及媒介如何使人们发挥公民的作用的问题。

展望未来,凡·祖伦以为“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后结构转向可以被看成开启了新的女性主义媒介政治的可能性,而不是如一般人所担

忧的女性主义与政治的关联。除了不胜枚举的女性主义媒介政策的机构改革,如争取平权机会、申请拒绝媒体换执照或肖像管制之类,后结构主义转向建议受众以新的阐释活动的激励和多样性的媒介文本的制度化生产,来认识乌托邦的不稳定性,从而瓦解社会性别的固定含义”(van Zoonen, 1994: 154)。笔者认为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后结构主义的转向,对身处无处可逃的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网络之中的妇女来说,只能作为妇女自我赋权(empowering)的途径之一,妇女解放的策略还需要更加多样的媒介使用与满足的举措,才能突破现有传播结构与社会结构的权力关系对妇女的限制与贬损。女性主义媒介研究与妇女解放运动相辅相成,凡·祖伦呼吁重视媒介与妇女公民意识的议题推进妇女解放,这是一种有见地的建议,但笔者更推崇妇女发挥潜在的能动性(agency),创办自己的另类媒介(alternative media),在意识形态领域实现话语的抗争。

另外,凡·祖伦的论证还是聚集于西方世界,对非西方世界的妇女与媒介的研究关切甚少,而在亚、非、拉地区,媒介反妇女的色情与暴力问题、象征性歼灭妇女的问题、妇女缺少媒介近用权的问题等还很突出,目前,仍然没有行之有效的对策性解决措施,学术界的呼声受制于各种局限,难以形成具有全球性的团结力量。同时,作者忽略了精致地介绍西方女同性恋者的媒介使用现状及其研究评价,因为荷兰是全球几个允许同性结婚的国家之一,在那样的社会情境中,女同性恋的媒介近用权与她们追求同性恋的解放运动的面貌和经验,对还没有法律保护同性结婚的国家来说,肯定具有学理和政策实施的参考价值。

对国内有兴趣于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读者来说,凡·祖伦的《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是值得精读的上乘之作,在其出版之后,微观分析与宏观思辨的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在此,简略推荐两本论

著。米莱尔·麦克唐纳德(Myra Macdonald)的《再现妇女:大众媒介中女性气质的迷思》(*Representing Women: Myths of Femininity in the Popular Media*, 1995)一书透彻阐释了在20世纪的进程中,西方大众媒介如何生产、再生产这些迷思,以及从现代到后现代,女性气质的支配迷思的持续与变迁,剖析了消费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妇女的控制。另一位女学者詹森(Sue Curry Jansen)所著的《批判的传播理论:权力、媒介、社会性别和科技》(*Critical Communication Theory: Power, Media, Gender, and Technology*, 2002)一书,关注全球经济市场一体化所造成的信息传播后果,如在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中,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在媒介的形成及合法化的机制,国际社会的传播资源和话语权,并以专题研究的形式论证了“国际新闻”、“橄榄球”、“人工智能”、“科学”、“信息”、“新世界秩序”等领域中彰显的或是潜藏的社会性别不平等,并深刻检视不平等的社会、经济、文化关系被维护、强化、抗争、挑战的过程。詹森极力推崇标志着彻底颠覆传统的、经验主义的科学和传播理念的新女性主义认识论。她把传播的角色与功能置于全球化语境的整体社会制度和权力关系中加以考察,既是对批判研究的传播理论的精心建构,也是对科技专制社会的社会性别与媒介、权力之间关系的细致探索。

本书用以描述性别二元结构的术语出现频率甚高,统一翻译如下:man(男人)、woman(妇女)、male(男性)、female(女性)、masculine(男子气)、feminine(女子气)、masculinity(男性气质)、femininity(女性气质)、sex(生物性别)、gender(社会性别)、sexist(性别歧视)。关键词gendered,本书翻译为“社会性别化”,例如书中讨论的家庭被“女性化”、战争与体育语言被“男性化”,等等。其中,masculine作修饰语时,根据被修饰词的具体情况而论,若旨在体现女性主义所要达成的目标——反对男性的话语霸权,如masculine discourse,就译为“父权

的话语”。关于本书中的人名和书名,凡能从网络或图书馆查到中文译名的,笔者一律尊重已经翻译出版并形成共识的译法。reflexivity 在社会学界通常翻译为“自反性”或是“反思性”:“自反性是人类行动的基本特征,其主要意味‘行动的自我反省或检视’(reflexive monitoring of action),和传统上我们所说的对行动的反省或反思很近,这种自反性可区分为道德的意义和认识论的意义。”(黄瑞琪,2005:64)笔者认同黄教授的见解,本译著因中文表达的流畅需要而使用了“反思”对译原文。myth 一词在大陆约定俗成的中文对译是“神话”,港、台学者一般翻译成“迷思”,迷思的形成也就是意识形态塑形的完成,笔者以为后者更具意识形态塑造的动态特征,“神话”太名词化,所以在本书中,凡有动态过程的意识形态塑造的意涵,一律使用“迷思”。articulation 原为“发音”和“连接”、“关节”之意,在此基础上,引申出辞意的连接,本书翻译成“意义的构连”或是“构连”,源自霍尔的原创性解释,这一“原创的构连(articulation)研究方法,如伯明翰学派(Birmingham School),其直接缘起并服务于一种批判的社会理论的‘文化’修正”(Jansen,2002:10)。本书第五章比较内容分析与符号学的研究方法,涉及一系列专有名词,统一翻译如下:denotation(明示义)、connotation(隐含义)、paradigmatic(系谱轴的)、syntagmatic(比邻轴的)、signified(所指)、signifier(能指)。

本书翻译的具体分工如下:曹晋独立完成目录、致谢、第一章、第二章、第八章、第九章;曹茂、赵舒静联合翻译第三章;曹晋、张抗抗联合翻译第四章;曹茂补充翻译、审校第五章(原赵潇爽翻译了前三分之一的内容),并独立翻译第七章;曹茂、张抗抗联合翻译第六章。赵舒静、张抗抗与赵潇爽都是选修我硕士课程的学生,翻译切实地训练了她们的语言能力,并开阔了专业视野,同时,翻译也加深了我们师生之间教学相长的切磋与友谊。而与我共同跋涉、转战南北的妹妹曹茂,

从她在清华读研开始,我们就联合做过香格里拉等地的田野调查。今年因我临时出国,时间紧迫,妹妹又一次雪中送炭,利用暑假帮助处理了本书的遗留问题,校订了原著中的个别细微的错漏。她的英语功力与遣词造句的睿智给予我诸多及时的帮助。所有章节翻译结束之后,姐妹合作,再次逐字逐句地审校、修正,并就棘手问题写信与原作者沟通,以确证我们的理解与她的本意契合。最后,曹茂与我多次交叉检查,共同完成全书的统稿。笔者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何林夏教授和版权部雷回兴女士在耶鲁大学的因缘际会,以及与编辑汤文辉的业缘情谊都刻印在这一译著的出版进程之中。追根溯源,还得感谢耶鲁大学东亚系孙康宜教授的宴请。更为感念的是,孙教授引领我进入社会性别研究的园圃,彼此愉快分享研究心得,深入合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业界与学界的声誉鹊起,已经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无论媒介商业化的压力多大,他们对学术园圃的执著看护依然如故。他们在美国重点大学图书馆影印中国珍稀文献的举措,不仅为中国学者提供了资料的方便,更是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积德之举。作为热爱出版业的学者,我在内心充满崇敬之情。

承蒙李新立、张丽等前辈的勉励,笔者与出版结缘。同时,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批准的2006年“金苗”计划也支持了翻译出版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 参考文献:
1. 黄瑞琪. 社会理论与社会世界.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 Cantor, M.. "Feminism and the Media". *Society* (July/August).
 3. Jansen, Sue Curry. *Critical Communication Theory: Power,*

Media, Gender, and Technology. Boston: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4. Macdonald, Myra. *Representing Women: Myths of Femininity in the Popular Media*. London: Edward Arnold.

5. Rakow, Lana F.. *Women Making Meaning: New Feminist Directions in Communication*. London: Routledge.

6. Reinharz, S.. *Feminist Methods in Social Research*.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7. Zoonen, Liesbet van. *Feminist Media Studies*. London: Thousand Oaks and New Delhi: Sage.

致谢

本论著源于同事之间的探讨、与学生的问题交流、文献的广泛阅读、朋友的各种建议、妇女运动的辩论、研讨会的聚首和一系列因缘际会。我极其感怀这些见解的交流,即使我无法一一勾勒他们/她们中的每一位对本书所作的贡献。然而,我还是希望明确地提及对我从事女性主义研究和完成本书给予帮助的人士。我要感谢引领我关注后结构主义理论的伊恩·安(Ien Ang),她毫不留情的批判精神提供了一种激发智识的范例。科林·斯帕克(Colin Sparks)对本书与我的早期研究项目总是给予支持的泉源,并让我在将来也期盼他一如继往的激励。我的密友约克·赫尔梅丝(Joke Hermes)与我的情谊达十年之久,无论工作,还是生活,她提升了我学术生活的乐趣,并且陪伴我度过无尽的学术挫折。如果没有她,这本论著不可能写就。

目 录

| | |
|-----------------|----|
| 译者序 | 1 |
| 致谢 | 1 |
| 第一章 导论 | 1 |
| 女性主义 | 3 |
| 文化研究 | 6 |
| 编码/解码 | 11 |
| 第二章 “新”主题 | 14 |
| 女性主义对传播研究的批评 | 18 |
| 传播研究中的女性主义主题 | 21 |
| 女性主义促进了新典范吗? | 37 |
| 第三章 “新的”范式? | 39 |
| 扭曲 | 41 |
| 社会化 | 46 |
| 作为仪式的传播 | 49 |
| 文化研究 | 54 |
| 第四章 媒介生产与社会性别编码 | 58 |
| 生产、编码和协商:《美国警花》 | 59 |
| 媒介生产研究 | 62 |
| 媒介生产的社会性别化结构 | 67 |
| 编码 | 83 |
| 第五章 媒介文本与社会性别 | 88 |
| 反映真实的符号:内容分析 | 92 |
| 再现真实的符号:符号学 | 99 |

目 录

| | |
|---------------|-----|
| 第六章 观看者身份与凝视 | 116 |
| 男人审视女人 | 118 |
| 超越精神分析 | 127 |
| 女人看男人 | 130 |
| 第七章 社会性别与媒介收讯 | 141 |
| 阅读言情小说 | 146 |
| 电视和家庭 | 153 |
| 妇女和肥皂剧 | 157 |
| 社会性别的技术? | 164 |
| 第八章 研究方法 | 169 |
| 女性主义研究方法 | 170 |
| 诠释的研究策略 | 173 |
| 品质控制 | 190 |
| 第九章 结论 | 195 |
| 参考文献 | 205 |
| 中英文人名对照表 | 230 |
| 关键词对照表 | 240 |

第一章 导论

在我写作这本论著期间,我接到荷兰广播电台的一位记者的电话,邀请我参加一场关于麦当娜(Madonna)的圆桌讨论。之所以以麦当娜为主题来聚会,是因为她的CD和《情欲》(*Erotic*)上市之后,与其所到之处一样,引起了荷兰媒体的空前骚动。我当时告诉那位记者,我是一个麦当娜的粉丝,肯定乐意参加讨论。结果,这位记者惊异万分,他原以为我这样的“女性主义者应该反对麦当娜利用性感之躯在色情市场创业”。他本来认为女性主义者会反对麦当娜,其他的文化批评者才较接受她,但正如我因不愿采取记者预设的立场而令他失望一样,大多数荷兰女性主义的文化批评者也与我的态度一致,对此他真是无可奈何,因为他找不到一个批评麦当娜的女性主义者,最后,这位记者只好取消圆桌讨论。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我的学生身上,电视台邀请她去做一个谈论她的硕士毕业论文的电视节目,主题是关于主流媒介与商业活动中日益剧增的男性裸体。显然,电视制片人期望这个节目从流行文化中社会性别角色的颠覆视角来展开讨论,男性裸体意味着男人能够扮演女人的角色,那么,这就是男女已经平等的表现。我的学生以她收集的

论据驳斥了制片人的观点,但制片人却忽略了我学生的重要论题和贡献,认为学生深刻的见解“过于琐细而且不够直截了当”^①。

非学院内的人们对学生与教授们的女性主义文化和媒介批评的理解有限,相应地就产生了上述情况。根据她们的逻辑,女性主义对媒介的观点意味着对流行文化进行明确、自信而自以为是和强硬的谴责,这是因为流行文化充斥社会性别歧视并且压迫妇女,对社会大众产生了不良影响。于是,学生、老师和新闻工作者批判、反对这种认为女性主义狭隘地描画媒介与文化实践的立场,如上述案例所展示,大多数新闻工作者的确要求女性主义者秉持这样狭隘的立场。更为复杂的是,不仅仅是非女性主义者建构僵化与苛刻的女性主义文化批评,就妇女运动阵营本身来说,对媒介产品大规模的,且不留情面的谴责也是司空见惯的(Davies et al., 1987)。

我作为一个女性主义的媒介批评者,穿梭于妇女运动、新闻界和如前所述的学术界的各种现实、需求和利益之中,抗争于女性主义媒介批评的限制阐释的同样境况之中。显然,一种直接的、单一的和认同的女性主义声音是许多女性主义者和非女性主义者所一致寻求的,也可能期望在构成当代媒介争论的复杂与困惑的议题中寻觅到某些意义和方向。

虽然本书旨在开创女性主义与大众媒介的思考模式,尽管我的立场格外鲜明,但我既不排斥或者拥护流行文化,我也不打算给出任何正确的路径、一致的观点或是最终答案。相反的,本书是想提供一种对过去数十年来庞杂、异质的女性主义媒介理论与研究的洞察。故本论著希望服务于各种妇女研究,以及媒介或传播科系的研究者、学生与教师的需求。本书除了描述和阐释多样的女性主义媒介理论与研

^① 关于男性身体的再现将在第六章详尽讨论。